

五四运动研究述评

鲁 振 祥

在中国近代史、中华民国史研究领域内，五四运动是个倍受重视的课题。大陆、台港、国外，都有不少学者从事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之多，车载斗量。近十年来，大陆学者们的研究成果，尤为可观。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的学者间，在观点上都存在着一些不同的看法，有些问题至今仍在争论不休。本文拟就大陆70年来，特别是1949年以来对这个课题的研究，其中又主要是五四爱国政治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评述，至于其他地区和方面的情况，不列入评述的范围，只在必要时稍加涉及。

70年研究概况

五四运动研究的历史，同运动本身至今的历史同样长久。还在运动爆发的第三天，就有人以《市民运动的研究》为题，对5月4日北京学生集会游行的性质和意义作出论断^①。10多天后，正式出现“五四运动”一词^②。20余天后，有人对“五四运动

① 作者涵庐，见1919年5月6日北京《晨报》。

② 5月18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发表的《罢课宣言》和《上大总统书》中，都使用了“五四运动”一词，均见1919年5月20日北京《晨报》。

的精神”作出概括^①。爱国运动的末期及其过后不久，一批记述运动过程的资料相继出版^②。在20年代，开始是国民党领导人，接着是共产党领导人，都在总结近代以来人民革命斗争经验教训时，对五四运动给以很高评价^③。但是，学术界把五四运动作为一个重要课题来研究，则是开始于30年代中期，特别是新中国诞生以后。

30年代中期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研究的逐渐开展，是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国民党专制统治的加强，促使人们对“五四精神”进行反思，不少进步学者企图从中获取一种思想武器，来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国内民主政治的实现。1935年5月，生活书店出版陈端志的专著《五四运动之史的评价》，全书20余万字，从近代以来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发展中，对五四运动作了较全面的论述。1936秋冬到1937年春，北平思想界掀起“新启蒙运动”，其主题之一，就是“怎样从新估计‘五四’的价值，怎样批判地接受‘五四’未完成的工作”^④。1937年五四运动18周年时，北平许多报刊出版了五四纪念特刊。此后，直至新中国成立，不论是国统区，还是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历年结合“五

① 见罗家伦(署名毅)：《“五四运动”的精神》，文中把五四运动的精神概括为三种：“牺牲的精神”、“社会制裁的精神”、“民族自决的精神”。《每周评论》第23期，1919年5月26日出版。

② 如：海上闲人编《上海罢市实录》、杨尘因编《民潮七日记》、蔡晓舟杨景工同编《五四》、吴中弼编《上海罢市救亡史》、龚振黄编《青岛潮》、管盒编《学界风潮纪》等。各件后均收入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辑的《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中。

③ 国民党领导人如孙中山，在1919年10月18日的演说和1920年1月29日的《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对“今次学生运动”和“五四运动以来”的“新文化运动”作出很高评价，见《孙中山全集》第五卷第140、209—210页。大革命时期共产党的许多领导人都有论及五四运动意义的文章发表，瞿秋白的《“五四”纪念与民族革命运动》(署名双林，《向导》第113期，1925年5月3日出版)、陈独秀的《二十七年以来中国国民运动所得教训》(《新青年季刊》第4期，1924年12月20日出版)、张太雷的《五四运动的意义与价值》(《中国青年》第77、78期合刊，1925年5月2日出版)，是有代表性的几篇。

④ 自非：《新启蒙运动在北平》，《读书月报》第2号，1937年。

四”纪念日和历次民族运动，都不断有论述五四运动“光荣传统”、“启蒙精神”的文章发表。毛泽东于1940年1月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观点来分析五四运动，把对五四运动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新中国诞生后的近40年中，五四运动研究同我国整个学术事业一样，成绩颇为显著，但道路十分坎坷。

从建国至1965年，是五四运动研究的初步发展阶段。50年代相继出版的中国革命史、中共党史的简要读本和教科书，都把论述五四运动作为重点内容之一。有关五四运动的专著，从建国前夕至1958年出版10余种，其中华岗的《五四运动史》于1951年出版，后几次再版，是有代表性的一种。其他有：李何林的《五四运动》、贾逸君的《五四运动简史》、洪焕春的《五四时期的中国革命运动》、王可枫的《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诞生》等。1950年和1957年先后出版《“五四”纪念文辑》和《五四运动文辑》，前者分为论文辑要、回忆与纪念、文献选录三部分，后者收入1950年至1956年报刊上有代表性的文章12篇。1959年五四运动40周年前后，五四运动研究掀起一个高潮。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南京史料整理处于1958年编成《五四运动史料汇编》10册，辑入北洋军阀政府有关档案630件。1959年学术界出版专著和资料多种，其中有：《十月革命对中国革命的影响》、《五四爱国运动资料》、《五四运动回忆录》、《五四运动文选》和《五四运动在山东》、《五四时期期刊介绍》、《光辉的五四》等。1960年出版《五四运动在上海史料选辑》、《纪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论文集》。1961年出版《五四运动话天津》。1962年出版《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反对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斗争》。1963年出版《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初稿）第一卷于1962年出版，该书对五四运动的论述占有相当大的篇幅，基本代表了当时学术界的研究水平。由丁守和、殷叙彝撰写的《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是研究五四思想文化运动史的重要成果，对这个运动发生、发展及各种思潮传播与论争的情况，作了系统的考察。这个时期对李大钊、陈独秀等五四时期重要人物的研究也有开展，彭明的《五四时期的李大钊和陈独秀》（《历史研究》1962年第6期），是有代表性的一篇。60年代上半期，报刊上曾就五四运动的领导权、性质、时间断限及工人阶级由自在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等问题展开讨论，发表过不同意见。但是，当时学术领域已被“左”的气氛所笼罩，这些讨论未能深入地开展下去，特别是涉及运动的领导权及其性质这类毛泽东已做过结论的问题，不可能出现正常的学术争鸣，最好的结果也只能是进一步阐释毛泽东的论断。

“文革”10年，五四运动研究处于停顿状态。那时编印的一些中共党史本子，在论及五四运动时，大都是简单重复毛泽东的论断，谈不到什么学术研究。大批孔孟之道、大讲“儒法斗争”之时，五四运动曾格外受到青睐，但五四时期的许多人物和事件都被改铸了。不要说胡适，就是当时的陈独秀，甚至李大钊，都成了反面的或不值得称赞的人物，历史的正面角色只剩下鲁迅和毛泽东。“打倒孔家店”涵盖了一切，而这个口号甚至被说成是由无产阶级所提出。失去历史的真实，当然也就称不上史学研究了。

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五四运动研究同其他学术领域一样，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期。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界掀起较1959年40周年时更大的研究热潮。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了大型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总计全国各地学术机关和高等院校提出的论文，以及各地方各高校发表的文章，超过200篇^①。讨论会后出版《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三辑。资料、专著大量增加，1979年一年内即出版10余种，后又陆续出版数种。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选的《五四运动回

① 《中国历史学年鉴》，1979年，第184页。

忆录》(上下续三册)、近代史所近代史资料编辑组编选的《五四爱国运动》(上下册)和《秘笈录存》、近代史所和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史料编辑部编选的《五四爱国运动档案资料》、张允侯等编辑的《五四时期的社团》(四册)、北京师范大学校史编辑室编辑的《五四运动与北京高师》等,都为五四运动研究提供了大量宝贵资料。这个时期的资料整理和出版,在地域的开拓上有很大进展,除记载北京、上海两地运动情况的资料外,有关五四运动在天津、浙江、武汉、河南、湖南、重庆、山东、贵州等地的情况,都有了专辑资料出版。在若干种专著中,彭明积30年研究而写成的《五四运动史》(1984年出版),代表了五四运动研究的新的水平。该书50余万字,以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根据,对五四爱国运动和文化运动都做了详尽的论述。李新、陈铁健主编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第一卷《伟大的开端》(1983年出版)、肖超然撰写的《北京大学与五四运动》(1986年出版),也都是这方面的力作。10年中报刊上有关五四运动研究的文章大量涌现。总计建国以来报纸刊物发表的有关五四运动的文章大约在千篇左右,其中绝大部分是近10年发表的。

二、建国后学术研究的进展与观点分歧

建国后五四运动研究中的不少观点和结论,都来自30年代末、40年代初毛泽东的论述。毛泽东在《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新民主主义论》、《反对党八股》、《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等许多著作和报告中,都对五四运动做出论断。建国后学术界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基本上就是沿用和发挥毛泽东的一些观点,诸如:五四运动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的运动,又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它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思想上、干部上的准备,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五四运动是在俄国革命和列宁的号召之下发生的,“是当时无产阶级世界革命的

一部分”；运动开始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是当时运动中的右翼）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到“六三运动时”，便成了“有广大的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了”；那时“虽然还没有中国共产党，但是已经有了大批的赞成俄国革命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五四运动的缺点，是存在着形式主义的、绝对化的看问题的方法，等等。但是，人们对这些观点的理解并不完全相同，不赞成或不完全赞成这些观点的也有人在，因此，在研究中便出现了一些不同意见的争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们开始从教条主义的禁锢中解脱出来，重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来考察五四运动的历史。随着研究领域的拓宽和研究工作的深入，新的问题和新的观点不断提出。建国以来、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学术观点的进展与分歧，举要如下：

首先是关于五四爱国运动（政治运动）方面的若干问题：

五四运动的领导者问题。大体说来，1939年五四运动20周年以前，一般都认为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或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1940年1月毛泽东提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概念之后，出现由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运动的观点。1950年邓拓发表《谁领导了五四运动？》一文，给五四运动下了一个定义：“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革命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统一战线为基础，而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①。华岗的《五四运动史》也强调五四运动是“以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为领导骨干”^②。1962年朱务善撰写的《五四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既说“领导五四运动的是当时共产主义知

① 1950年4月29日《人民日报》。

② 《五四运动史》，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19页。

识分子和革命青年学生”，又说“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领导了五四运动”^①。一些论者不赞成朱文的后一种观点。他们之中有的主张五四运动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认为这时“无产阶级的政党虽然还没有诞生，但是这个运动的阶级内容、口号、方向、目标等，凡足以体现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诸特点，已经初步地具备了”^②。有的主张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认为这种知识分子“在爱国运动和文化运动两个领域里都起了骨干和领导的作用”，这种领导“属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范畴”，“是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萌芽形式”^③。近年对运动领导权问题仍有所讨论，除“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领导的”和“无产阶级领导的”^④这两种观点的进一步发挥外，有人提出：“五四运动的真正推动和领导者应该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其理由是：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在运动前的“宣传鼓吹”，“提高了人民群众的政治思想素质，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他们推动了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向纵深发展”，并为“五四运动发展制定了策略、方法、目标、原则及指出注意的问题”；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只是作为活跃分子或骨干分子积极参加了运动，“但活跃分子或骨干分子并不就等于领导者，因为领导者是一个地位问题，活跃分子是一个行为问题”，而且，“他们的成长、作用发挥都是因为有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支持和帮助”^⑤。如同文章作者自己所述，这是“对传统观点的挑战”。这确实是一个可以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① 《历史研究》1962年第4期。

② 孙思白：《略谈五四运动革命性质问题》，《文史哲》1963年第3期。

③ 刘惠吾：《试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1963年2月26日《文汇报》。

④ 分见：张圻祺：《略论五四运动的领导权》，《中学历史教学》1980年第2期；陈培钧：《关于五四运动的领导权问题》，《江西大学学报》1984年第2期。

⑤ 黄金华、涂良燕：《也谈“五四”运动领导者及性质》，《理论探讨》，1988年第5期。

五四运动是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问题，这是估价五四运动意义的一个重要方面，同上述领导权问题密切相关。前引朱务善的文章认为：五四运动“没有共产党没有无产阶级领导”，“它的爆发是自发性的”，所以，它“还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而“只带有新民主主义的色彩，表现出新民主主义的初步形式，为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揭开了序幕”。它是从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的“一个部分质变，而不是全部质变”。对朱文的观点，许多论者提出反驳意见，认为五四运动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它本身已经具有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其理由可以综述如下：（1）五四运动是在十月革命的鼓舞和列宁的号召下发生的；（2）运动的指导者是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3）运动的后期无产阶级成为斗争的主力；（4）运动的内容和方向是沿着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道路发展的；（5）运动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从思想上和干部上作了准备^①。这些论者也指出：由于没有共产党的领导，五四运动同以后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它还不完备，它只是“开始”。这些论述代表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此后20年中，再没有人就此问题展开讨论。近来提出五四运动系由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这一观点的论者，同时认为“五四运动仍然属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性质，不属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性质”^②。

五四运动的“彻底”性问题。长期以来人们在论述五四运动的伟大意义时，都赞同并转引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论断。近来有人对此提出异议，认为五四运动的爆发主要是“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影响”，因此就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商、学界的罢市、罢课固

① 持这样观点的人很多，见孙思白：《略谈五四运动革命性质问题》，《文史哲》1963年第3期；路尔铭等：《为什么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历史研究》1963年第2期，等。

② 见前引黄金华等：《也谈“五四”运动领导者及性质》。

然“不敢把斗争矛头指向北洋政府，更不敢从根本上加以推翻”，工人阶级的罢工同样“没有提出更高的纲领口号”，所以三罢斗争都具有“软弱性和妥协性”^①。

社会各阶级、阶层在运动中的表现和作用问题。以往对工人阶级的罢工评价较高，对青年学生的先锋作用也有较多的肯定，但对商人罢市的作用则估计过低。近来有的论者着重探讨了罢市斗争的作用和影响，认为五四运动中商人的罢市，不仅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主义精神，而且起了激发工人群众罢工的作用，并促成了北京政府罢免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商人罢市所表现的软弱性，是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同样具有的^②。另有论者对工人阶级作用问题提出不同以往的看法，认为：“工人阶级是五四运动中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但还不是或基本上不是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更没有在运动中起主力军作用”^③。60年代初还展开过五四运动中工人阶级是否开始转变为“自为阶级”问题的讨论。有人认为：工人阶级“到了五四政治罢工，由于斗争水平和阶级自觉水平（即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都已发展到了新的水平，开始初步具有自为阶级的一些基本成分了”^④。另有人认为，那时工人运动还只是处于“自发阶段”，党的成立才“使中国工人运动开始进入自觉阶段”^⑤。近年还有人“对整个农界在五四爱国运动中的重要贡献和积极作用”作了考察^⑥。

巴黎和会上中国拒约实现的原因问题。以往人们只讲爱国群

① 张成德：《试论五四运动中罢市斗争的作用和影响》，《安徽史学》1988年第2期。

② 上引张成德文。

③ 扈光琰：《新论五四运动中的工人阶级》，《华东石油学院学报》1988年第2期。

④ 荣天琳：《论中国工人阶级向自为阶级转变的最后阶段》，《北京大学学报》1962年第1期。

⑤ 项立岭：《试论中国工人运动由自发到自为的转变》，《学术月刊》1961年7月。

⑥ 胡元利：《五四爱国运动中农界的表现》，《党史研究》1986年第1期。

众运动的推动,近年有人作了更为全面的考察,认为中国这次“敢于在世界列强云集的巴黎和会上拒签对德和约,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实现的”。根本原因固然是各阶层人民大众的强烈反对签约;但也应看到,拒约的实现,与统治阶级的特殊的内部状况,即袁世凯死后出现的“分裂型政治”有直接关系。由于国会与政府、直系与皖系、南方与北方、研究系与安福系、英美与日本,“种种矛盾交织在一起,互相争斗着,因而中央政府的地位极为脆弱,以至最后竟无力对签约问题作出任何决定,只好推之于中国代表团”。中国代表团的主导意见始终是“有条件签约”。“当各种最低保留条件均被列强否决后,拒约就不可避免了。”^①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述。

五四运动的时间断限亦即运动的“狭义”与“广义”之分的问题。建国后对五四运动的研究,一向是根据《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观点,把五四运动与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联系起来,并包括反帝反封建政治运动与反封建文化运动两个方面。为了对这样的观点作出更清晰的说明,60年代初提出区分“广义”与“狭义”的五四运动的问题,但论者们的具体见解,不尽相同。“狭义”的五四运动,一般是指“五四”至“六二八”群众爱国运动,对“广义”的五四运动,有人主张从“五四”至中共成立,有人主张从十月革命至中共成立,有人主张从新文化运动兴起至中共成立。“广义”的五四运动,一般称作“五四时期”^②。对这样的区分,国内研究者未见反对意见,但苏联和日本的一些学者则持否定看法。

其次,是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思想解放运动)方面的若干问题;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伟大意义及其局限。五四运动所起到的

-
- ① 邓野:《巴黎和会中国拒约问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2期。
② 见李龙牧:《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历史研究》1963年第3期;孙思白:《研究五四运动必须解决的一个问题——对“五四”时期范围的广义和狭义的理解》,1963年5月16日《文汇报》等。

思想解放的作用，在“文革”前就是人们所重视的研究课题。经过“文革”10年的思想禁锢，人们从切身经历中深切感到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迷信和盲从的重要，因此对五四时期思想解放的意义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周扬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专题报告，提出“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的概念，而五四运动是其中的第一次。他指出：“封建传统的打破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就。”^①民主与科学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两大口号，也是近代传入的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集中表现。研究者们对这两个口号给以格外注意。他们指出：民主首先是反对专制争取民主的一种政治要求，同时也是反封建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当时虽然在世界范围内已是旧思想，但在中国还是新思想”^②，它在反封建思想革命中发挥了巨大作用。那时的科学思想，主要是指科学态度、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这种思想的宣传，对中华民族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当时民主与科学思潮的伟大功绩，不仅在于“反对了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更重要的是它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开辟了道路”^③。

一些论者对毛泽东的五四文化革命是“彻底地”反封建文化的提法，提出不同的理解，认为这里所说的“彻底”只是就这个时期的文化革命精神而言，当时“对传统的封建思想文化进行了异常坚决、异常猛烈的攻击，确实表现了一种彻底的革命精神”；但“并不是说几千年的传统的封建文化在这一个回合中就被肃清了，由于当时使用的武器主要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加以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决定了五四时期反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斗

①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1979年5月7日《人民日报》。

② 徐宗勉、朱成甲：《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思想革命》，《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

③ 侯外庐：《五四时期的民主和科学思潮》，《红旗》1979年第5期。

争，不论在广度或深度上都是很很不彻底的”^①。关于五四时期反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有人具体提出如下四点：宣扬了民主，“但没有彻底清算封建帝王思想”；提倡了科学，“但没有从根本上摆脱束缚人的精神枷锁”；批判了封建伦理道德，“但没有深入批判封建家长制”；鼓吹了平等自由，“但没有触及封建特权思想”^②。

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过去不少人把它比拟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中国的“启蒙运动”^③。近来有些论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除了‘启蒙’这个词可以在极广泛的意义上使用于世界各地的反封建斗争之外，把20世纪发生于中国的五四前期新文化运动比拟为欧洲14至16世纪发生的‘文艺复兴’或18世纪发生的‘启蒙运动’是很不恰当的”，两者不能相提并论。五四前期的新文化运动，“只是‘文艺复兴’在一个落后国家里的微弱的回声”^④。文艺复兴运动带有“拨乱反正”的性质，有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作为正的前提；而五四运动不承认有正的前提，它不是拨乱反正、道德重整式的运动，而是对正统文化展开全面的总批判^⑤。

“五四”精神与反传统文化问题。在海外五四运动的研究

① 孙思白、韩凌轩：《“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文史哲》1979年第2、3期；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② 陈汉楚：《五四时期反封建主义的历史局限性》，《学习与探索》，1981年第1期。

③ 持这种观点的人很多，如胡适始终把五四新文化运动称作“中国文艺复兴运动”；30年代“新启蒙运动”中，论者们称“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一个典型的启蒙运动”、“中国第一次最伟大的启蒙运动”；李何林于1948年写的《五四运动》的小册子，称“中国的‘五四运动’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是中国的‘启蒙运动’”。丁守和、殷叙彝把他们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著作定名为《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李泽厚在其《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也使用“启蒙运动”的提法。

④ 刘桂生：《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属性及其主要口号的释义分析》，《教学与研究》1988年第1期。

⑤ 刘再复、林岗合著《传统与中国人》。

中，有人从崇儒立场出发，对五四精神持否定态度，提出“五四”是全盘否定传统文化和主张全盘西化的论断，甚至认为“五四”是“文化大革命”的先河。这种观点传入国内，有人赞成，也有人反对。反对者认为：“五四没有全盘性的反传统问题，而主要的是反儒家的“吃人礼教”。不能把儒学与传统文化等同起来，“五四精神在反儒家问题上是要出现诸子争鸣的学术自由空气”，“即令对儒学，五四启蒙者也并没有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五四精神的光辉就在于，“它反对具有强烈封建主义色彩的纲常伦理与吃人礼教”，但是，“五四启蒙者对于传统文化缺乏全面的再认识再估价，经过批判使应该保存下来的保存下来，吸收融化在新的思想体系中”，这是它的毛病所在^①。有的论者对五四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作出分析，认为这是一个有严重缺点的口号，不应完全肯定。这个口号没有准确地概括出当时评孔思潮的主流，它对民族文化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和极端片面的思想方法”。能够体现当时思想主流的口号，应该是反对“吃人的礼教”，这个口号由鲁迅提出，经吴虞等人响应，风靡一时^②。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是越来越被人们所注目并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很可能会出现更为广泛的讨论。

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历史进程。大多数论者都以“五四”为界，把五四新文化运动划分为两个阶段，“五四”以前为“资产阶级文化思想领导的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五四”以后为“无产阶级文化思想即马克思主义指导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③。有的论者划分为三个阶段：1915年9月至1918年10月，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1918年11月至1919年6月，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向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思

① 王元化：《论传统与反传统——从海外学者对“五四”的评价说起》，1988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

② 韩达：《“打倒孔家店”与评孔思潮》，《百科知识》1982年第11期。

③ 李新、陈铁健主编《伟大的开端》，第175页。彭明的《五四运动史》等著作也都持此种观点。

想解放运动的转变阶段；1919年7月至1921年7月，是马克思主义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①。还有的论者把新文化运动的下限后延至1922年7月《新青年》的休刊或1923年科学与玄学之争。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是研究工作开展较早的一个课题，60年代初已形成这样一些主要看法：在中文记载中，第一次提到马克思的，是梁启超1902年10月发表于《新民丛报》上的文章《进化论革命者颌德之学说》；十月革命前，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资产阶级革命派、无政府主义者、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等在他们的刊物上都曾提到过马、恩的名字和学说，或译载过马克思著作的片断，但马克思的学说在他们那里受到严重歪曲，因此不能说他们是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的标志的，是李大钊于1918年上半年写的《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三篇文章的发表，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形成马克思主义宣传运动^②。

近年这个课题继续受到重视，并取得进展。一些论者经过考证指出：在中文报刊上第一次出现马克思名字的，不是1902年梁启超的文章，而是1899年出版的《万国公报》（上海广学会办）上刊登的《社会演化》（英人颌德著）一书的中文节译（译名《大同学》）。在对此问题的探讨中，有人作出这样一些论断：《大同学》是“中国第一本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书”，梁启超是“第一个传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人”，朱执信是“热忱地传播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针对这些论断，有人提出反驳，认为：《大同学》向中国人介绍的是蒙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梁

① 金普森、邱钱牧：《试论“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杭州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② 见蒙澍：《论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历史研究》1954年第3期；丁守和、殷叙彝：《从五四启蒙运动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三联书店1963年版；彭明：《五四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教学与研究》1964年第1期，等。

启超是在传播颌德主义，批判马克思主义。朱执信介绍马恩生平 and 学说，是要寻找一条防止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因此都不能看作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在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是从五四时期起，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的”^①。另有人指出：“应明确区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介绍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这样两个不同阶段，不应该把早期介绍笼统称为传播”。“前一阶段从总体上说，还是从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后一阶段则是无产阶级的思想运动。”^②论者们对“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情况做了进一步发掘，对杨匏安、邵飘萍等人的贡献做出评价。有人认为杨匏安是“五四时期在华南地区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他的《马克思主义》一文“可以说是《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姊妹篇”^③。

三次论战。这是从50年代起逐渐形成和普遍使用的概念。近年有些论者认为把五四时期思想上的讨论和争论概括为三次论战并不科学，应该废止这种提法。但一般论著仍继续使用。对“问题与主义”论战的性质问题，出现截然相反的观点。一种意见认为，这次论战“是马克思主义和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历史、哲学诸方面的观点的全面较量，是两种敌对思想体系的斗争”^④。另一种意见认为，这次论争是“一场被误解的学术轰鸣”，胡适与李达“纯粹是学术界内部就如何用西方先进文明来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学术辩论，决不是两条路线根本对立的政

① 刘桂生、钱逊：《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1983年5月25日《人民日报》。

② 蔡德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中的一个问题》，《江淮论坛》1983年第2期。

③ 彭明：《五四运动史》第457、458页。

④ 谭双全：《五四时期的“问题与主义”论战》，《湖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

治纠纷”。“胡李之说异曲同工，实无本质区别。”^①对这次论战的影响和结果，有人提出这样的看法：那种认为通过论战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一方“驳倒了”胡适一方而取得“胜利”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通过这次论战，社会革命论和社会改良主义两种主张都扩大了自己的影响，而当时后者的影响又明显地胜过前者^②。有的论者在强调不可低估三次论战的历史意义的同时，指出了当时马克思主义者在论战中存在的不足^③。

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近年五四运动研究中的热点之一，主导倾向是重新肯定胡适在当时所起的积极作用。有人从考察新文学运动出发，认为胡适确实是当时文学革命的“首举义旗之急先锋”。有人肯定他具有一定程度的反封建思想，如提倡个性解放，提倡妇女解放，鼓吹社会自由等。有人对他大力宣扬实验主义提出看法，认为：“胡适宣扬实验主义是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产物，适应了新兴民族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需要。”实验主义尽管自身包含着保守的反动的基本内容，但胡适把它拿过来，为我所用，并与当时新文化运动的条件相结合，却发挥了进步作用。它“有反宗教迷信的启蒙作用”，“适应了反‘天理’的需要”，“倡导方法论的研究”，“提出了求实的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反对封建思想的武器”。有人分析了五四时期胡适的阶级属性，认为他“是作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学者积极参加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为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为民族资产阶级提供了世界观和方法论”。他最后从

-
- ① 谢光前、吴志明：《一场被误解的学术争鸣》，《青年论坛》1986年11月号。
 - ② 官守熙：《关于一九一九年“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评论的商榷》，《内蒙古大学学报》1982年第2期。
 - ③ 谢宝生：《建党前后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三次论战》，《吉安师专学报》1983年第2期。

新文化运动统一战线分化出去成为反动文人，似应以1925年2月参加段祺瑞政府的“善后会议”和同年任“中华教育基金董事会”的名誉秘书为标志^①。

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形成问题。这是近年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研究中深入进展的一个问题。首先是对毛泽东提出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这一概念的理解问题。有人提出：

“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意味着在对马克思主义最基本原理的初步了解的基础上，相信共产主义，赞成俄国十月革命，主张暴力革命，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彻底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努力为此而奋斗；但同时仍然保留着若干民主主义观点”^②。不少人认为这样的标准过于严格，但具体论述又各有不同。有人主张，毛泽东所讲“赞成俄国革命”和“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在当时，是指：怀疑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和资产阶级民主、反帝坚决、欢迎社会主义、热心社会改造、赞助劳动群众的解放这样一些内容”，这样的知识分子处在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状态中”^③。有人主张，在当时，“革命民主主义者开始向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转变的主要标志应该是：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并用它作指导武器开始观察和重新考虑中国的问题。”重要的是“开始观察”和“重新考虑”^④。有人主张，这种知识分子的标准应该是这样两条：“一条是拥护十月革命，第二条是‘朦胧’地向往共产主义社会。所谓‘朦胧’，也可能是马克思主义思想，也可能是无政府主义思

① 以上见孙昌熙、史若平：《试论五四新文学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文史哲》1979年第3期；耿云志：《胡适与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历史研究》1979年第5期；胡曲园：《评胡适“五四”前后的哲学思想》，《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朱文华：《试论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和地位》，《复旦学报》1979年第3期。

② 张静如：《论李大钊同志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二）。

③ 王金铭：《论“五四”和党创立时期的陈独秀》，见同上书。

④ 冯建辉：《建党初期的陈独秀》，同上书。

想。当时较多的恐怕还是无政府主义思想”^①。

其次，是第一代共产主义知识分子何时形成的问题。有四种意见：（1）五四运动爆发时就已有大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2）1919年6月至1920年8月，即五四爱国运动后至上海共产党组织成立，中国出现了第一批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3）绝大多数激进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思想的转化，是在1920年5月至1921年7月这段时间；（4）“五四”前夕至1921年上半年，形成了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其中大部分在共产党成立后转变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②。

第三，是关于一些具体人物如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的世界观的转变问题。研究中观点分歧较大者，是对陈独秀当时是否完成了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的看法，具体意见有：转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成了马克思主义者，但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开始了由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转变，但没有最终完成这个伟大转变；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始终没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③。关于毛泽东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时间和标志，也有分歧。有人主张在1920年夏，有人主张在1920年冬或1921年初，后者的标志是1920年12月毛泽东写给肖旭东、蔡和森等的信及1921年初在新民学会年会上的发

① 彭明：《中国近现代史论文集》（增订本），广东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3页。

② 以上见张静如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张静如：《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年第4期；杨先文：《试论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转化的基本条件》，《中山大学学报》1983年第3期。

③ 以上见侯新夷：《建党时期的陈独秀是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内蒙古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王洪模：《关于陈独秀一生活动的的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85年第5期；王树芹：《如何评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山东师院学报》1979年第3期；沙健孙：《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北京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言，这时他明确表示赞成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①。

此外，还有一些问题，如五四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道路问题，以及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的研究等，不再一一列举。新问题的提出，学术观点的进展，不同意见的阐发，说明了五四运动研究无论是深度还是广度，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三、存在的几个倾向性的问题

长期以来，五四运动史研究受到的重视，是中国近代史领域中其他任何一个课题所不能相比的。这个课题取得的成绩和进展也最为突出。但是研究中仍存在一些问题。笔者以为，克服某些不良倾向，是今后研究取得更大进展的必要前提。

照抄照转现成结论，以革命领袖的某些论断作为评判是非的标准，把研究工作停留在解说现成结论上面，这曾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普遍现象。五四运动研究也不例外。不少著述在论及五四运动的意义时，往往都是把毛泽东的有关论断抄录一起，而不再进一步考察这些论断是否符合实际。例如，人们经常抄录的观点之一，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和“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但正如前面已引述的一些论者的看法，这样的论断必须加以限制性的说明，才是恰当的，而许多研究者却满足于照抄照搬。30年前黎澍发表的《论五四运动》一文，充满对五四运动伟大意义的肯定，但他的用语却是颇为实际的：五四运动是“一次强大的爱国运动，一次以提倡民主和科学为旗帜的思想革命运动，是中国民族的新的觉醒”^②。这种求实的评价不是更恰当吗？再如，五四运动由谁领导的问题，众多的论者都按照毛泽东的观点论证运动是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的。但是，前面介绍的许多人

① 见张佑、杨柯：《毛泽东从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标志和时间》，《北方论丛》1982年第5期；汪澍白、张慎恒：《青年毛泽东世界观的转变》，《历史研究》1980年第5期。

② 1959年5月3日《人民日报》。

考察的结果却是：这种知识分子的大批出现，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此前只有个别人（如李大钊）开始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按照这些考证，“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说又怎能成立？二三十年代中国共产党许多领导人和党领导下的思想界，都认为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它们的知识分子领导的。那么，前面提到过的无产阶级领导、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领导、知识分子领导、青年学生领导、资产阶级领导、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领导，这种种说法，究竟哪一种更接近于历史的实际？还有如何理解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问题，也应作出更符合历史实际的阐述，这些情况都表明，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长期固定下来的条条框框，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对运动作出更加符合本来面貌的评价，是五四运动研究应继续解决的一个问题。

研究工作中的片面性，是应该继续克服的另一个主要缺点。这种片面性突出表现在以下两点：其一，是过分地强调一个阶级、一类知识分子、一种思潮的作用，而忽视全面的研究，贬低其他阶级、其他知识分子、其他思潮的作用。我们从五四运动发动的过程及运动中各阶级阶层、各种政治势力的表现看，完全可以说这次爱国运动具有全民的性质。毛泽东也曾用三部分知识分子“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和“全国范围的革命运动”来说明五四运动的广泛性。我们再考察“五四”后思想解放运动的内容和影响，也决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中国第一代共产主义者的成长，它同时包括多种新思潮的传播，自由民主思想的开始普及，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为更多人所注意，新式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成长等方面，许多后来做出过卓越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文艺家、学者，都曾受过“五四精神”的洗礼。所有这些都是五四运动研究所应重视的方面。但在长时期的研究中，却只片面突出工人罢工的作用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骨干及领导作用，民族资产阶级被说成是被动消极的力量，一些活跃分子不被提及，某些上层人士的活动和主张被摒弃不谈。对五

四后的思潮，只突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五四运动的影响只强调为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它的时代意义只强调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这种狭窄和片面理解五四运动的倾向，近年有所改变，但拓宽研究范围，如实评价所有运动成分的作用，仍是值得注意的问题。这里应特别提到五四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这几乎是以往研究的一个空白。通行的观点是：“国民党没有在五四运动中起领导作用，它是站在旁边的。”^①而事实并非如此。特别是在上海，国民党人对群众斗争的领导作用是非常明显的。目前有人正在从事这个题目的研究，或许不久即可以看到这方面的成果。其二，是“斗争哲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思想对研究工作的影响，片面强调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潮的对立和斗争，强调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在运动中的立场、态度和目的不同及由此引起的斗争。五四运动前后（尤其“五四”之后），包括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各种思潮竞相在中国传播，中国思想界呈现出百家争鸣的局面。所有研究者都承认，这些思潮相对中国封建文化而言，均属于“新思潮”。但在有关著作中，又大都很少讲到它们之间的共同方面，即所有这些思潮的鼓吹者都表现了对社会现状的不满和改造社会的愿望，都在为贫穷落后混乱的中国寻找出路。当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思想体系和根本主张上的不同。即使被称作“地主买办分子”（这顶帽子并不合适）和“研究系政客”的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主张，也不无可取之处。在研究各种“新思潮”时，是既“见同”也“看异”，还是只“看异”不“见同”，这不只是研究方法的不同，而且是涉及到是否如实地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问题，涉及到能否正确对待那些有借鉴意义的思想观点的问题。同样，对民族资产阶级和某些上层人士在运动中的表现，是只强调他们的“动摇性”、“软弱性”以至“反动性”，还是如实写出

① 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党史研究》1980年第1期。

他们参加运动的情况，这里也涉及历史主义态度问题。

展开学术争鸣，是推动学术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一个学科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但是，长期政治运动极左的政治氛围，使研究者们背负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只好人云亦云。在五四运动研究中，情况相对好一些，但沉闷的空气也相差无几。60年代初对几个问题的讨论，并没有深入开展下去。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研究活跃起来，但仍没有形成具有一定规模和深度的专题讨论。如果我们把视野再扩大到某些外国学者对五四运动的研究，就会发现许多同我们似乎已成定论的观点迥然不同的看法，其中涉及到五四运动的领导权，运动的性质、意义、时间断限，政治运动与文化运动的关系，五四运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关系，五四运动与传统文化等一系列问题。1987年7月日本学者专门召开了“五四运动研究讨论会”，在许多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的交锋^①。相比之下，我国研究界的争辩气氛太不足了。这种情况必须改变。结合国内外的不同观点及已有的和将会有的研究成果，围绕几个基本问题深入讨论，将是五四运动研究深入的重要途径。

五四运动过去了70年，五四运动研究也已70年。建国以来，特别是最近10年来，积累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五四运动的认识大大加深了。现在面临的问题，一是根据当今改革开放的需要，选择那些具有现实意义的课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二是立足于今天的认识水平，以历史主义的态度，重新审视过去一些看法和结论，对五四运动作出更加符合运动本来面貌的评述；三是进一步拓宽研究范围，把那些本应是题中之义但却被忽略了的问题和方面，提到应有的地位。五四运动研究还大有可为。

（责任编辑：曾景忠）

（作者鲁振祥，1938年生，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① 见〔日〕中村哲夫：《日本学者对五四运动的评价》，《民国春秋》1988年第1期。